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96期(民國106年6月)，105-112
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湯晏，《葉公超的兩個世界：從艾略特到杜勒斯》
臺北：衛城出版，2015。557頁。

蕭雅宏*

外交名家葉公超（1904-1981），爲近代中國政界與藝壇聞人，生前閱歷多采多姿，「學術擅中西、達官兼名士」（程滄波語）爲其客觀寫照，故舊好友曾有憶往文字多篇，[1]對其昔日寓理帥氣、劍膽琴心之感，頗能一葉知秋。至於全面性質的研究文字迄今仍寥若晨星。[2]在葉氏的本行外交方面，2012年後出現江荷鳴、黃淑薰與羅文婷等碩士論文，[3]研究聚焦於戰後臺灣對外關係；由於材料限制，對於葉氏行事作風、黨政網絡、在美處境，乃至於回臺後遠離權力高峰的心境，基本上未加闡述。近年由於中外史料大出，對葉公超生平際遇有更多發皇者，首推阮大仁的作品，[4]他利用美國史丹佛大學現藏之〈蔣中正日記〉、阮毅成著〈中央工作日記〉等機敏材料，並以得天獨厚世家子身分，得以親聞老輩掌故，精心描繪出一幅1960年代葉去職疑案藍圖。然而，在葉

* 國史館科員

1 如秦賢次編，《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83）；葉崇德主編，《回憶葉公超》（臺北：學林出版社，1993）。

2 如：符兆祥，《葉公超傳：葉公超的一生》（臺北：懋聯文化基金會，1993）；傅國涌，《葉公超傳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。前者內容爲早期紀傳體平鋪直述，後者則以人際交遊爲主，對葉公超思想之展示有限。

3 江荷鳴，〈葉公超與中華民國外交（1949-1961）〉（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2）；黃淑薰〈葉公超與劇變時期的中美關係（1949-1961）〉（臺中：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2）；羅文婷，〈葉公超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的外交（1949-1961）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4）。

4 阮大仁，〈由蔣中正日記去看葉公超大使去職之經緯〉，收入氏著，《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4），頁數249-351。

公超逝世三十多年後，一部全面性生平思想研究的成果，仍難面世，原因不外乎：一則葉氏生性「述而不作」，多爲言論少見著作，後人難以推敲探究；二則外交理路複雜，非精通數種語文、熟諳判別史料，則對新聞事件與檔案難以綜合解讀。葉氏本人又是魏晉名士、不屑細務之洋派作風，晚年心境更難捉摸。《葉公超的兩個世界：從艾略特到杜勒斯》這本書出版，適時彌補了這個研究缺憾。本書作者湯晏，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、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；研究興趣爲民國文人雅士，著有《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》，因早年見過葉公超兩次面，埋下著書立傳的動機。作者史學背景毫無疑義，長年從事文學研究，以兼通文史訓練來談葉公超，專書有其可期之處。

葉公超，廣東人，爲中華民國著名外交官，曾任外交部長、駐美大使、政務委員與總統府資政。早年負笈英美學府，涉獵西洋文學，返國後任教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大等校，爲海內第一位引進艾略特（T. S. Eliot）思想者，其英美文學造詣，時人許爲第一。抗戰期間棄學從政，歷練於外交部會，政府遷臺後主持對外大計，例如 1952 年《中日和約》、1954 年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之簽訂，運籌帷幄於臺海險峻局勢。1958 年金門炮戰時，奉派出使華府，雙橡園期間周旋美國政要，大器風度，能力深獲中外好評，亦爲我爭取國際地位。1961 年其受外蒙古入聯合國案影響，在美舉措層峰多有誤解，於是奉召返臺，遭到罷黜；此後投閒置散，逐漸淡出政壇，晚年政治上僅掛虛銜，並兼任教職及參與故宮博物院、臺北市立美術館等文教事業。1981 年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。

本書既然副標題爲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」，自是有感於以往談葉公超者，或爲文藝，或爲外交，兩不相干，欲以傳記文學手法貫穿全書，理解葉的內心世界。第一部「知識的泉源」與第二部「艾略特世界」主要以其早年學思教研爲主，第三部「杜勒斯世界」則述涉足政壇、出使異邦到暮年生活。作者特別強調杜勒斯（John Foster Dulles）爲名，是指其進入外交領域的意思，並非受杜勒斯影響，以下分別評述。

一、知識的泉源與艾略特的世界

葉公超早年由叔父葉恭綽扶養，幼承家學庭訓，就讀南開中學後出洋，赴美新英格蘭貝茲學院（Bates College）、愛默思學院（Amherst College）求學，並拜在名詩人佛洛斯特（Robert Lee Frost）門下。取得大學文憑後，葉公超往英國劍橋遊學一年，接觸到艾略特的思想。1926 年返國後與吳宓結交，曾在北京大學、上海暨南大學兼英文課，並從事翻譯報刊工作，1929 年起轉赴清華大學外文系專任教職。清華時代經師人師，影響錢鍾書、楊聯陞、季羨林、趙羅蕤等學子。1936 年接掌北大外文系系主任，其後抗戰軍興，仍擔任臨時大學、西南聯大外文系系主任，同事聞一多、柳無忌盛讚其行政長才。

《新月》刊物是葉公超加入學術社群的第一戰，側重文藝思想兼論政治，期間計發表書評、小品文與論文多種，並結交胡適、潘光旦、徐志摩、梁實秋等文壇菁英。還帶來一批清華高材生錢鍾書、吳其昌、卞之琳投稿發表，為《新月》注入新的活力。作者分析此一時期葉公超的文章，多為評介西方思潮，如美國史家畢爾德（Charles A. Beard）、羅素（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）、杜威（John Dewey）等；也介紹西洋詩人艾倫坡（Edgar Allan Poe）、西方小說與牛津字典等。總而言之，葉公超的發表相較於同人雖然惜墨如金，但作者看來都是相當有分量的一家之言，其譯作、評述之英文造詣可見一斑。在《新月》因批評訓政、黨政，文字賈禍停刊後，《學文》成為葉公超另一文章馳騁場域，其同時也是實際主持編務者。《學文》重視文學批評、詩歌賞析，葉氏自己也發表〈從印象到評價〉，可略知他的治學態度。[5]

葉公超引介艾略特的思想，是從《清華學報》的〈論艾略特的詩〉開始，介紹了有關艾略特的 3 本書，分別為討論其詩、思想信仰與評論集；[6]其後又

5 如有林徽因、吳世昌的詩作、文章；徽因，〈你是人間的四月天〉，《學文》，卷 1 期 1（1934 年 5 月），頁 3-5；吳世昌，〈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〉，《學文》，卷 1 期 2（1934 年 6 月），頁 80-146；葉公超，〈從印象到評價〉，《學文》，卷 1 期 2（1934 年 6 月），頁 122-129。

6 Hugh Ross Williamson, *The Poetry of T. S. Eliot* (London: Hodder & Stoughton, 1932). Thomas

在《北平晨報》文藝副刊發表另一篇〈再論艾略特的詩〉，作者就單就這兩篇論文與其他紀錄，來談葉氏的「艾略特世界」，旁及整個葉之文學思想。引介艾略特，是當初胡適認為難懂、徐志摩又早逝，這項介紹歐美詩壇的工作便落到葉公超手上。有三點是值得我們深思：一是葉公超認為艾略特的詩有一種古今錯綜的意識；二是艾略特主張詩中用典；三是葉氏翻譯艾略特的作品相當出色，可說情溢乎辭。對於艾略特在 1930 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引起多大迴響，不得而知；但對葉公超而言，詩人豐富了其生命與學養，是可以肯定的。除此作者還發現其喜愛引用唐宋詩人對比西方詩作，作為一種比較文學，可知葉氏於中國古典文學頗有心得。

作者用心做了一點小考證：如葉公超在美國專攻歷史與哲學、在英並未取得碩士學位，可能未與艾略特有過交集，最多旁聽而已。行文至此，讓我們聯想到葉公超於經史、書畫、金石、詩酒等術藝之學無所不窺，晚年贊助「雲門舞集」，又與現代舞名家瑪莎葛蘭姆（Martha Graham）數面之雅，從西洋文藝到當代思潮，當真是智識厚積薄發，學問泛觀博覽，皆得力於早年用功之勤。

二、杜勒斯的世界

葉公超自 1940 年轉任董顯光主持之中央宣傳部工作開始，即展開外交生涯，先是被派往新加坡、倫敦之中國國民黨中宣部；其後因王世杰訪英賞識其才情，旋轉入外交部服務。葉公超在 1945 年後歷任參事兼歐洲司司長、常務次長、政務次長，至 1949 年代理外交部長而真除，戰後還曾代表我國為慶賀緬甸獨立特使，4 年之間仕途搏扶搖而直上。政府來臺後，葉公超於外交部長任內有 3 次大展身手，即《中日和約》、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與劉自然事件。

《中日和約》，係二次大戰後盟國對日《舊金山和約》之濫觴，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受到國共內戰影響，未能以戰勝國代表出席，只得另行與日本訂約。

McGreevy, *T. S. Eliot: A Study* (London: Chatto and Windus, 1931). T. S. Eliot, *Selected Essays: 1917-1932* (London: Faber and Faber, 1932).

而此約對於我國地位、雙方邦交乃至於臺灣主權，都有相當實質重要性。葉公超以首席代表身分，對日方斡旋許久，說出「發現日本人太難對付」，實則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，以一撤退來臺、籌碼無幾之我國政府，還要矢言以戰勝國自居，日人木村四郎七、河田烈等輩出言不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（頁 311-312、318）。但葉以技術官僚身分，搬用法理，動輒人情，歷經多次會談，最後能趕在《舊金山和約》生效前簽訂，可說居功厥偉。這不僅是葉擔任外交部長的第一仗，也足以爲他青史留名。

作者認爲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是葉公超的另一項建樹。由於 1950 年代海峽兩岸對峙，中共虎視眈眈，我國又因故未能加入區域性組織，美國雖有第七艦隊巡弋協防，但臺灣亟需美國正當性防衛與援助，因此雙方兩造促成，可謂水到渠成。惟蔣中正不希望此約限制反攻大陸行動，又寄望於更多美援，葉公超銜命談判一年多，與美國討價還價結果，終於在 1954 年 12 月簽約。吾輩參考近人研究，此約決策者爲蔣中正與杜勒斯，至少顧維鈞與葉公超是執行者身分，且該約政治宣示大於實質意義。[7]無論如何，此約不僅是圍堵政策之一環，也是冷戰期間臺灣足以力抗中共進犯之護身符。

葉公超在劉自然事件中的角色，也值得留意。1957 年美軍雷諾（Robert G. Reynolds）因故槍擊臺灣民眾劉自然後，美軍軍事法庭竟宣判無罪；隔天葉氏就約見美國大使館代辦，表達嚴重關切。待駐華大使藍欽（Karl L. Rankin）向蔣中正抗議民眾搗毀使館時，葉公超發揮了外交官的政治藝術，舉行正式記者會澄清謠言、說明我方立場；並不斷向美方疏解以釋誤會。稍後幫美方找到了兩間市區的房子作爲臨時辦公所在，並作賠償，還對藍欽說了一段話：「請閣下鄭重轉告貴國，應視我爲平等夥伴（equal partner），而不把我當作窮親戚（poor relative），甚至於叫化子（hopeless beggar）看待」（頁 393）。至此可看出作爲外交大員之葉公超，應對得體，有爲有守，據理力爭能在關節處不失立場。

7　張淑雅，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：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〉，《歐美研究》，卷 24 期 2（1994 年 6 月），頁 51-99。

至於 1961 年「外蒙古案」，我們藉由解密檔案已清楚了解：當年蔣中正因有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秘密管道，得甘迺迪（John F. Kennedy）口頭保證，必要時以否決權排除中共進入聯合國；換取蔣在外蒙入聯時，採取棄權而非否決。[8]事實上 1950 至 1960 年代中華民國的對美外交，並非外交部技術官僚爲主，而是包含了總統府宣外組、中央黨部、新聞局、聯合國代表團；乃至於蔣經國與美國中情局管道、宋美齡與美國人脈等多頭馬車，大事形成決策或共識，最後在中常會上由蔣中正拍板定案。掌握了這一面向，就可以知道葉公超自稱「常務次長」玩笑話其來有自，縱使他有扛鼎之志，作者過分強調葉有通天之能了。葉公超出使異邦，在美 3 年，華府人脈不少，整體而言，作者說「共和黨主政艾森豪任內兩年，葉大使做得有聲有色」，但第 3 年「民主黨甘迺迪上臺後……人事摩擦」，則不那麼順手（頁 419），當是中肯之論。

作者指出，葉公超曾反對蔣中正 1960 年連任總統一事（頁 414），這點倒是前人未見，倘若此事能理出更多頭緒，與隔年外蒙古案串聯一氣，葉氏之不受歡迎，大概即是「新仇舊恨」的結果。持平而論，葉公超在《中日和約》與劉自然事件充分表現出其不凡能力幹才；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則是因勢利導，洞見觀瞻；外蒙古案則是錯估長官與形勢，進退失據；斟酌得失，可謂一個好的外交家，認眞負責；但不見得是勝任官場的外交官，伴君如虎，以致於被拔除了烏紗帽。

三、第三世界：再探葉公超的晚年生活

作者希望有人能再探葉公超的「第三世界」，即感情及藝術領域（引言，頁 25），其實本書已經爲我們指引了第三世界：即擺脫學術與政治後，葉的晚年生活初探。「怒而寫竹，喜而繪蘭，閒而狩獵，感而賦詩」是眾人對葉的晚年印象，但 1961 年罷官後，從他的生活到內心世界又是如何？在第三部尾

8 參考王正華，〈蔣介石與 1961 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，期 21（2009 年 9 月），頁 128-132。

聲「罷官後」一節，作者引用近人零星口述，爬梳葉公超的最後 20 年。例如女記者的巧遇與訪問、作家梁實秋與報人葉明勳的回憶、詩人洛夫的結識拜會，還有作者親身經歷在臺大旁聽等。當然葉公超於 1978 年再度訪美，這是睽違 17 年後終能出國，眾人咸認葉大使「確實身體 , 思想都老了」（頁 478），縱然還是紳士風度、侃侃而談；但長年不能教書、不能出國，間有特務隨行，內心無奈可想而知，作者對葉是同情且悲憤的。

近人兩則有關葉公超之重要回憶，作者顯未留意，「沙裡淘金」不妨參考：

曾任葉公超晚年秘書的陸景武，在近作〈我曾追隨過葉公超大使〉一文說葉去職後，張群與蔣宋美齡都曾居間向蔣中正進言，國士無雙，惟葉「寧折不屈」，連張群欲登門造訪，葉都回應「請勿枉駕」，無怪乎陳香梅說「無須道歉惟有自傲」。蔣經國繼任總統後，特聘葉公超資政一職，後人都以爲是禮遇超擢，向來惟有五院院長級卸任後聘爲資政，政務委員僅聘爲國策顧問。陸景武說「蔣經國堅請葉大使前往主持」美國召開的世界華人漢語論壇、並敦請葉大使出任僑務委員會主委，陸文難免延譽，是否實情不得而知，但身爲私人秘書貼身觀察，仍具有參考價值。[9]

有「地下駐日大使」、「中統第一號人物」之稱前國大代表蔡孟堅的回憶則更貼切，其說：葉公超遭罷職後，心情苦悶傲慢，數次見面對他大發牢騷。例如政務委員一職，他自嘲是「身邊有『特務』，『政事』不准問」、「行政院會議時，有人隨同『保護』」；又對蔡孟堅嘆氣說：「彼此在國內遭忌，自必到處受阻」，張大千亦轉述葉的牢騷說：「這是一個『無聊』的地方，上下都『無聊』」。蔡孟堅說葉能赴美開會散心，是某政要在蔣經國面前力保，才得以成行；在美欲拜會葉公超，葉竟婉拒說：「我這次能來，等於火燒島犯人的早晨『放風』，必遵限期歸國；否則，擔保人受連累」。[10]蔡孟堅與葉公超因《中日和約》而結識，交情匪淺，此處窺見葉公超的處境相當艱難。

9 陸景武，〈我曾追隨過葉公超大使〉，《僑協雜誌》，期 151（2015 年 3 月），讀史散記，頁 23-29。

10 蔡孟堅，〈葉公超博士半生浩嘆──從接洽中日合約結識談到交往經過〉，收入氏著，《蔡孟堅傳真續集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 321-332。

從這兩則小故事約略可知，葉公超不容於當道，見忌於「今上」；本書末節受限於原始材料，多為老生常談，述說皆為一般傳聞，也看不出作者有何類於「新大陸」的發現。如能掌握葉政務委員任內，對於保釣運動、退出聯合國、中日斷航、中美斷交等大事感想，當可展現更多新意。[11]作者一再說葉公超有才子氣、大手筆，是辦外交的人才，但是，這種才子手筆，作官的材料，是否適用在二十世紀風雲詭譎、人治大於法治的中國政壇，就值得商榷了。

本書有一小缺點，即作者顯然同情葉公超，因此全書成了控訴書，實為傳記寫作大忌，不能平心靜氣，許多史實也疏於查證。舉例如 1927 年「北方一批大學教授……不滿意北京八所國立院校欠薪的惡習而紛紛南下」（頁 76），此恐非主因，應是抗議北洋段祺瑞執政「三一八事件」發展至張宗昌濫捕報人等一連串政治事件。言艾略特「受中國舊詩的影響是很可能的，值得我們去研究」（頁 172），單憑其友人透過日本人譯過詩經一事，間接推論又嫌太過武斷。又云「葉公超想當行政院長」（頁 493，註 8），部份敘述又有待商榷，例如：葉公超為何棄學從政？實為其叔之託保護毛公鼎不被日人所獲，因故繫獄，幾瀕非命，脫險後是他轉入政界的一大關鍵，理當加以論述，全書未見有任何解釋，殊不可解。談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，竟說是美國干擾中國內政（頁 375），實叫人不敢苟同。談曹聚仁為兩岸密使事，道路傳言，以為葉公超從中牽線，蔣中正當會看到信函（頁 409），參考《陳誠日記》可知為稗官野史。再者，葉公超單單寫過一篇〈關於非戰士的魯迅〉紀念魯迅，可知魯迅對其影響力有限，似無必要專寫一章（第九章），作者似乎過於強調意識形態了。然瑕不掩瑜，總而言之，本書仍為近年葉公超研究的一本佳作。

11　阮大仁的文章就有新發現：「葉公超是陳誠的人馬，在臺北常去陳府打秋風。」蔣經國主持行政院院會時，葉公超當眾發牢騷：「這是一個鬧著玩的政府。」（“This is the student government.”）阮大仁，〈由蔣中正日記去看葉公超大使去職之經緯〉，見氏著，《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》，頁 249-351。